

105 允晨叢刊

自由主義 Liberalism and the 與 Humanistic Tradition 人文傳統

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丘慧芬 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丘慧芬編。

——初版。——臺北市：允晨文化，2005[民 94]

面；公分。——（允晨叢刊；105）

ISBN 957-0329-91-2（平裝），

1. 自由主義—論文，講詞等 2. 人文科學—論文，講詞等

143.6107

93024765

允晨叢刊¹⁰⁵

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

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作者：錢永祥等

主編：李怡慧

發行人：廖志峯

責任編輯：鄧楚樑

美術編輯：劉寶榮

法律顧問：蔡欽源、邱賢德律師

出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21 號 6 樓

服務電話：(02)2507-2606(代表號)

傳真電話：(02)2507-4260(代表號)

<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Mail: eas@seed.net.tw

劃撥帳號：0554566-1

初版日期：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日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字第 2523 號

電腦排版：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

製版：全凱數位資訊有限公司

印刷：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裝訂：協成裝訂行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 400 元

ISBN:957-0329-91-2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200747

港台書

允晨叢刊 105

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

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



丘慧芬 編

目 錄

前言	丘慧芬	5
道德人與自由社會：		
從林毓生先生對中國自由主義的一項批評說起	錢永祥	33
古代羅馬政治概念中的自由 (Libertas)	邢義田 譯	55
Unintentional Pluralism and Pragmatism in China's Early		
Imperial Political Culture	Steven C. Davidson	101
說「義」三則	陳弱水	151
荀子性惡論證的商兌及疑義探索	朱曉海	193
對《文史通義·言公》的一個新認識	王汎森	229
儒生冒襄的宗教生活	李孝悌	257
自由與自治：		
梁啟超政治思想中的「個人」	楊貞德	283
章太炎論個人與自由：		
與柏林的比較	羅久蓉	307
道德、正當性與近代國家：		
五四前後陳獨秀的思想轉變及其意涵	楊芳燕	339
Liang Shuming, Education, and Change ...	Catherine Lynch	375
歷史的陳寅恪：		
「自由思想、獨立精神」與中國政治現代性	郭亞珮	397
Of Culture and Freedom: Yin Haiguang and the Liberal		
Critique of the Chinese Past	Wah Cheng	417

敘事式歷史哲學的興起黃進興 • 459

歷史迷思與文學記憶王德威 • 493

人文的超越：

高行健《一個人的聖經》及其思想意義丘慧芬 • 521

前言

丘慧芬

《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這本論文集，是為祝賀林毓生先生七十壽辰所完成的一份獻禮。參與撰稿的十六位作者，目前都在台灣或北美地區，從事學術研究與教學工作。其中有分別在一九七〇、八〇與九〇年代直接受業於林先生的學生，也有間接受過他的思想影響的學者。大家撰稿的共同心願，除了希望以這本論文集為林先生祝壽以外，也希望藉此對於他數十年來為中國自由主義的發展和為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所做出的研究與貢獻，表示衷心的敬意與感佩。

關心自由主義在台灣與中國大陸命運的人，大概對於林先生的論述與關懷都不陌生。我想根據他的著作在這裡將他的思想與學術背景做一摘要引介。至於林先生的學術本身，其論式複雜而抽象，已成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領域之內的一家之言，如欲對之加以論述，應以專著或論文的形式進行，不是這篇〈前言〉所應承擔的任務。林先生代表性著作包括：*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中譯：《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86，1988)，《思想與人物》（台北：聯經，1983；大陸版《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北京：三聯，1988），《政治秩序與多元社會》（台北：聯經，1989，

1999)，以及《從公民社會談起》（預定二〇〇五年底於台北：聯經，上海：季風同時發行）。在引介林先生的思想與學術背景以後，我將提供讀者文集內各篇論文的摘述大要。我們的焦點首先移至林先生的小傳。

林毓生先生祖籍山東黃縣（現改為龍口市）。七歲時，隨家人從東北安東（現改為丹東）移居北京（當時稱作北平）。八歲在那裡就讀北師附小，十三—十四歲就讀師大附中。一九四八年底，大陸變色在即，他隨父母偕弟妹遷徙台灣。在台北就讀成功中學與師大附中。一九五四年，林先生進入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就讀。師從沈剛伯先生、勞貞一先生和在哲學系執教的殷海光先生。此時，他受到殷先生主張確立個人自由與憲政民主的啟蒙，接觸到殷先生譯成中文的，二十世紀傑出政治、經濟思想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海（哈）耶克（Friedrich A. Hayek）批判社會主義的經典著作《到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在威權政治高壓之下，堅持自由主義原則的殷海光先生所展現的人格光輝和他的政治理念，以及海耶克先生的著作所顯示的深刻思想，激起了林先生對於西方自由主義強烈的探索與鑽研志趣。為了獲得跟隨海耶克先生念書的機會，一九六〇年，他申請到海耶克執教的芝加哥大學社會思想委員會（The Committee on Soci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Chicago）深造。在海耶克先生與委員會其他師長——阿倫特（Hannah Arendt）女士，席爾斯（Edward Shils）先生，葛佳恩（David Grene）先生，與瑞德斐（James Redfield）先生等——的指導下，研讀自由主義和自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以降西方人文傳統及近世社會思想的精粹原典。

林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的過程，相當不尋常。他是先由西方學術思

想界頂尖人物指導精讀西方原典，然後轉向在哈佛大學執教的中國思想史巨擘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先生問學，在與之持續切磋的脈絡中專研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領域內的課題。在這個過程中，有日以繼夜的鑽研、有困思的艱難、有知性的喜悅、也有精神的徬徨。不過，他走過這個曲折的過程以後，其格局與眼光，自是不同。下面筆者將根據歷年來與林先生的訪問談話以及他見諸文字的自述，略作說明。^①

一九六三年夏天，當林先生通過博士資格考試，可以專心準備撰寫論文的時候，他的內心深處，卻出現了精神危機。他研讀西方原典的生活，使他逐漸深入西方思想的內部。當時，他對幾項西方思想史上的問題，諸如蘇格拉底之死的意義，托克維爾與穆勒（密爾）的自由理念的比較等，均已產生了濃厚的、深入探討的興趣。然而，表面上，他自己和他的幾位知交、委員會的師長們和殷海光先生，都以為他是要撰寫與中國自由主義有關的論文的。雖然林先生在到達芝加哥大學以後，與殷先生的通信中持續關懷著中國大陸與台灣，但他在芝大從未上過任何有關中國的課程，也很少接觸中文書籍和報刊。他晝思夜想及與委員會中的師長和同學們討論、辯難西方原典之內種種問題的生活，充盈著知性的喜悅，很使他覺得「食髓知味」。不過，這

①以下關於林毓生先生學思背景的說明，徵引他本人的著作甚多，多未加引號以免讀者感到過於累贅，特此聲明。同時必須聲明的是，這一部分文字，業經林先生過目並惠予訂正，謹此致謝。林先生已經發表的這方面文字，見〈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的政治環境與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影響〉台北《聯合報·副刊》，1994年10月17-21日，此文刪節本改題〈殷海光先生對我的影響〉，《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代序二〉頁1-23；〈試圖貫通於熱烈與冷靜之間——略述我的治學緣起〉台北《聯合報·副刊》，1997年5月3-10日，或林毓生著《熱烈與冷靜》〈代序〉（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8），頁1-24；〈林毓生：自由主義·知識貴族（施雨華訪問·紀錄）〉，《南方人物周刊》（2005年1月5日），頁84-86。

樣的生活卻又使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問題，變得相當遙遠。社會思想委員會的政策是：學生在博士資格考試通過以後，可以選擇任何言之成理的題目（落實考試之前宣稱的題目、修改原來的題目、或另外找尋一個嶄新的題目），然後進行博士論文的撰寫工作。然而，這種學術自由，卻使林先生深感猶豫、徬徨，精神無法集中了。他無法決定究竟應該撰寫西方思想或中國思想方面的論文。他知道他必須做一明智的抉擇，但他卻不知如何做此抉擇。最後是海耶克先生的一席話把林先生從兩難的困局中「解救」了出來。海氏說：「關於你究竟應該選擇什麼課題做你一生第一個系統性的專題研究，這件事你必須自己做決定。不過，我可以把我的經驗提供給你作參考。自從一九一八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我從位於義大利的奧匈帝國陸軍的前線撤退，相當艱苦地返回維也納我父母的家中，然後進入維也納大學攻讀以來，這四十多年中我的所有著述，都直接或間接與我的個人關懷（personal concerns）有關。」

海耶克先生的這些話，對林先生產生了醍醐灌頂的作用，使他的精神危機得以化解。它重新肯定了林先生把關懷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前途當作他個人知性探索的出發點，自覺當以在委員會中接受的訓練為背景，決心從他的「個人關懷」出發，專心致志投入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研究。

幾年前，林先生在麻省劍橋訪友期間，認識了史華慈先生。史先生出身西方思想史，而非漢學。他素以分析精微、見解深邃，聞名於世。史先生是以世界史的視野與淵博的人文關懷來治中國思想史的，而他的基本立場則是深具人文精神的自由主義。當時，林先生與史先生一見如故，彼此甚為投契。此時，林先生在海耶克先生推薦的獎學

金支持下，決心到哈佛去向史先生問學，並請他指導撰寫芝大社會思想委員會的博士論文。從那時起，史先生與林先生開始建立起歷久彌新、亦師亦友的終生友誼。

林先生在一九七〇年獲得芝加哥大學博士學位。同年開始執教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校區歷史學系。這時，宋祖錦女士已成為我們敬重的林師母。忙碌於進修學位，上班持家，以及撫育師弟和師妹的各種角色之間，師母不僅成為林先生一切生活事務的司令主宰，而且更是老師的心靈伴侶與得以專心研究的精神支柱。

此後三十多年，林先生除了經常出席國際學術會議，或受邀到台灣、中國大陸、香港、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地各重點大學講學，更重要的是發表了他的代表性專著與多篇中英文論文。這些著述的論證與發現，使他成為西方學術界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的主要代表之一，也建立了他在東亞研究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領域內的重要地位。

（除了在中國近現代思想史領域之內的著述以外，林先生也曾發表過數篇深具原創性的中國古代思想史方面的論文。）林先生於一九九四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在此之前，北京中國文化書院已於一九八八年敦請林先生為該院導師。之後，他分別在二〇〇二及二〇〇四年，榮膺中國美術學院與南開大學歷史學院名譽教授。在出席學術會議，來回各地講學，發表論文與規律的教學和研究活動之間，時間就不經意地滑向了二〇〇四年。踏入「從心所欲」的這一年，林先生決定將歷經三十多個寒暑的教職畫下句點，開始與師母過著榮退後不受牽絆的無拘生活。有形的例規羈束雖然不再，林先生卻一如既往，仍在為他數項尚待完成與正在進行的研究計劃繼續努力。顯然，一個具有「個人關懷」的思想工作者，早已將己身的研究探索當做永無止歇的

終生志業了。

看過林先生著作的人，大概都會發現，他數十年來的思考與著述，始終關注著兩個相互關聯的重大問題。這兩個問題是：(一)中國近現代激進主義的起源及其災難性後果的歷史涵義；(二)支撐憲政民主的政治、法律、社會、思想與文化條件究竟為何，以及如何對於中國傳統進行他所提出的「創造性轉化」以獲致這些條件。我們也可以說，這兩個問題是與林先生自青年時期開始一直對於中國為什麼自五四高舉「民主」與「科學」的旗幟以後，卻一直無法真正落實的困惑與焦慮分不開的。他自己說過，他在大學求學期間，常到中研院史語所閱讀當時被禁的各種五四刊物。《新青年》和《新潮》上的文章，給過他很多的刺激，那些文章中的思想，與他當時年少心靈的愛國情懷產生了迴盪不已的互動與呼應。(必須指出的是，這裡所說的林先生的愛國情懷，接近托克維爾闡釋的「反思的愛國主義」(reflective patriotism)。它必須與「本能的愛國主義」(instinctive patriotism)作一必要的區分。「本能的愛國主義」則接近現在台灣所謂的國族主義。)他後來會以魯迅，陳獨秀和胡適做為他底英文專書所研究的五四代表人物，應該並非偶然。另外，他於一九七二年撰寫梁漱溟的父親，梁巨川，何以自殺的重要論文，也源自此時閱讀興起的「感動」。我們或許可將這種沉潛在記憶裡的「感動」經驗看做是林先生常喜引用博蘭尼(Michael Polanyi)所說的那種「支援意識」。這「意識」的內涵雖然不易明言，卻會不時牽引著林先生發展出他日後研究的課題。

毫無疑問，林先生對於民主與科學一直無法在中文世界健全發展的困惑與焦慮，也在殷海光先生給他的那種「五四後期人物」的身教

與言教中，獲得了更深的強化。殷先生在政治壓迫下「威武不能屈」的人格與他底堅毅精神所支持的政治理想，對於林先生做人的風格與治學的方向均產生了極大的影響。這裡所謂政治，是採用亞里斯多德的定義。政治是公民們參與公共領域之內政治過程的行為。面對中國的過去與現在，殷先生認為中華民族未來的唯一出路，是建立與發展個人自由的價值、基本人權的觀念、民主的憲政、與建基於經驗的理性。殷先生的主張，當然並非僅有——即便是亞里斯多德所界定的一一政治意義。面對人生與人類文明的發展，這些主張也有其生動的意義。不過，在蔣氏政權統治台灣的年代，殷先生的主張，撼動了蔣氏政權威權統治的「正當性」，因此對它構成了嚴厲的挑戰，所以都有直接的政治意義，其超越政治意義的意義，則是間接的。當時一般人只能做順民，並不被允許參與政治過程，所以無法變成公民。然而，殷先生和《自由中國》社內同仁，卻積極爭取以言論介入政治領域。在那個絕不容許反對黨存在的年代，殷先生和他志同道合的朋友們，以讀書人的身份卻扮演著近似反對黨的角色。他們這樣做的唯一資源、唯一依靠，是自身不畏迫害的道德力量和公民的責任感所支持的愛國情懷。殷先生說：「惟有對民族、對國家、對當前危局抱有嚴重責任者，才不辭冒險犯難，據理直言，據事直陳。」（《殷海光全集》XI，頁244）

林先生遠在海外實行憲政民主的國家工作，在他的生活環境中當然不存在如何面對專制國家政治迫害的問題。不過，他數十年來秉承殷先生遺志，堅持儘量使用中文發表他底深具公共意義的學術著作和政治、社會與文化評論，希望以公開發表言論的方式，積極參與中國大陸與台灣的公共生活。這是殷先生的人格與理想對於林先生產生極

大影響的實證之一。實證之二則是：與殷先生完全一致，林先生始終堅定主張，中國大陸與台灣走向未來的唯一康莊大道，乃是建立與發展個人自由的價值、基本人權的觀念，與民主的憲政。（至於林先生是否仍然同意殷先生帶有邏輯實證論色調的主張，認為理性必須建基於經驗？這個複雜的問題，在此只能存而不論。）

不過，在林先生繼承殷先生所揭櫫的目標，積極以言論推展中國自由主義向前邁進的工作中，他的著述逐漸展現了與前輩中國自由主義者（包括胡適之先生與殷海光先生）許多的不同之處。這是從表面上看去相當曲折而實際上卻是一個自然發展的故事。林先生底自由主義的精神，受到海耶克先生的影響很大，雖然其內容也與海氏的自由哲學並不完全相同。林先生曾說，殷海光先生給他的是「經過西方自由主義轉化的中國知識份子道德精神的召喚」，而海耶克先生給他的則是「知識貴族精神的召喚」。海氏的身教與言教賦予林先生一個重要的啟示：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不存在應該或不應該追求的問題；只能盡最大的努力。在這個過程中的知性活動有其獨立性與自主性，它不受外界（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等）勢力的干擾，也不會為了趕時髦而從事這種活動。在這個過程中，一旦有所發現，即使不被外界所瞭解，甚至被外界誤解、曲解，也只能堅持下去。這裡也不存在應該或不應該堅持下去的問題。這種知識人對於自己的發現堅持的態度，卻不影響他以開放的心靈、知性的好奇心，面對別人的意見，並樂意接受別人對他的啟發。這樣的「堅持」與「開放」，看似相反，實則相成；因為一切是以忠於知性的追尋為準。他的成就感，因此只能帶給他知性的喜悅，卻不會產生知性的傲慢，當然也與孤芳自賞的偏狹心態無涉。這種遵循理知召喚與指引的人格素質展示著，用韋伯

的話來說，知識貴族的精神。知識貴族，不是什麼社會貴族，也不是經濟貴族。知識貴族的精神乃是——不是多數人做得到的——在「諸神戰爭」的現代性文化中，始終堅持忠於知性神明而無懼於其它神祇的精神。

毫無疑問，林先生數十年的探討與研究，以及他做為一個知識份子的思想關懷與道德承擔，都促使他成為一位深具感召力量的師長。但是，我還是願意用幾個實例來呈現林先生對於學生的影響。首先，我要徵引一段三十年前一個在麥迪遜受教於林先生的大學部學生，對於他教學風格的回憶。現任美國聯邦政府司法部副檢察總長（Deputy Solicitor General,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的 Michael R. Dreeben，便是這個學生。他在去年年初接到林先生決定在威大退休的信以後，回覆給林先生的長函中說：

「我接到了您解釋為何做出退休決定的深思長信。我帶著很複雜的心情念完了這封信。您的來信，展現了所有讓您成為一位深具啟導力量的老師的品質——您對嚴謹思考與分析的重視，您選擇表達思想中曲折幽微看法時所用的仔細而準確的語言，您對知性生活的重要性所抱持的熱情，以及您對學生的高度期望與對教育價值的肯定。這封信帶我回到了在麥迪遜選修您第一門課時，我的經驗的種種記憶。在那門課上，我學會了讓深奧的文本吐露其內蘊祕密時所需運用的分析技巧。我開始體會到，如何同情地深入歷史上個別的思想家出自內心對於思想世界進行的探索，可以成為我們了解歷史與社會上更加寬廣趨勢的關鍵樞紐。我同時也回想起您是如何透過教學顯示著長者的風範：您個人的文化素養與對知識的誠實信守，您對於學問事業本身的熱情，您對每個人人格的尊重，您對歷史上的聲音與當今世界上的問

題具有重大關係的信念，您對學者之間跨世代連繫的持續關注，您對自己身師長的尊敬與感情，以及您對每個人必須有自己的立場這個重要性的堅持。」

“I received your long and thoughtful letter on your decision to retire from teaching, explaining your reasons for so doing. I read the letter with sharply mixed feelings. Revealed in your words were all the qualities that make you an inspiring teacher — your attention to rigorous thought and analysis; the precise and detailed language you select to express the nuances of your ideas; your passion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an intellectual life; and your high expectations of students and the value of education. It brought back to me the memories of my own experience in the first course I took with you at Wisconsin. In that class, I learned the skills of analysis involved in making an abstruse text yield up its secrets. I began to perceive how a sympathetic engagement with a particular historical thinker’s subjective approach to the world of ideas could be a key to understanding wider currents in history and society. And I also recall the modeling you did through your teaching: your personal decency and intellectual integrity; your passion about the enterprise of learning; your respect for the individual personality; your conviction of the vital relevance of historical voices to today’s issues; your constant awareness of the connection across generations between scholars; your reverence and affection for your own teachers; and the importance of taking a stance.” ●

林先生的學生，大概都會在讀到這段話時，想起自己跟老師念書

●對於 Michael Dreeben 惠予同意我在這裡徵引他信上的這一段話，謹此致謝。

時的許多難忘經驗。至少，這段話也讓我希望從另一角度來呈現林先生對學生的啟發。

參與這本祝壽文集的撰稿者中，羅久蓉，朱曉海，李孝悌，鄭華君和我，都是一九八〇年初跟林先生念書的同班同學。當時我們知道，有一位女學生叫Christine Chan在上一年跟林先生念過書。但是，我們都不認識她。有一天上課時，林先生忽然提到「陳慧慈」的名字，大家就問她是誰。林先生頓了一會兒，就非常認真地說：「陳慧慈就是 Christine Chan; Christine Chan 就是陳慧慈。」我們當場一楞，就笑成一片。林先生看到大家笑得高興，雖然不解，卻也跟著我們笑開了。我自己當時大概是覺得，老師平常要求我們思想不可失之簡單化，論證更須謹嚴，何以會給了我們一句邏輯上好像無法推演的有趣陳述，所以禁不住大笑。後來，我自己意識到，林先生那種獨特介紹學生的方法，可能與他平常就不願意隨便把一個人化約成不是這個人屬性的原則有關。因此，當他還沒想出如何能最妥當地介紹這位同學時，他很可能覺得必須照著他認為是價值互相等同的兩個符號來開場。這雖是件小事，可是，這件小事讓我看到林先生對學生人格完整不可化約的尊重。

林先生對學生的尊重，當然也得到師母的全心支持。所以，我們在麥迪遜念書的那兩年才能每年都吃到師母在感恩節或聖誕節時為我們準備的火雞大餐。不過，有一年感恩節，我們到了老師家後，才發現師母得了氣管炎，無法下樓來過節。大家當時都覺得不該打擾，可是林先生說，師母一定要我們留下過節，而且，火雞已由老師負責烤熟，大家就趕緊一起幫著安排餐具什麼的。這時，老師說必須先給師母做個炒飯，我就自告奮勇去準備。等老師一看我倒了那麼多炒菜